

Bidirectional Retrograde Utopian Illusions——The Similarities and Discrepancies of the Images of "End Point" and "Road" in *on the Road* and *South Highway* (*La Autopista Del Sur*)

Daozhong Zhang^{1, a}

¹College of Education for the Fu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a201911039344@mail.bnu.edu.cn

ABSTRACT

Jack Kerouac's *On the road* and Julio Cortazar's *South Highway* (*La Autopista del Sur*) are the masterpiec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of the last century, based on their respective times, they have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future of mankind, the state, the nation and society as individuals, and they all believe that the alienation of time and space has hindered people's exploration of the future of Nations and the ultimate fate of mankind, so these two works reflect the two writers based on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the thinking and solutions given. But their efforts turned into bidirectional retrograde utopian illusions.

Keywords: Jack Kerouac; Julio Cortazar; image; Human destiny

双向逆行的乌托邦臆想——《在路上》与《南方高速》中的“终点”“路途”意象及其内涵异同

张道中^{1, a}

¹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学院, 北京, 中国

^a201911039344@mail.bnu.edu.cn

摘要

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与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作为上世纪美洲文学的杰出作品,都立足各自时代对作为个体的人类、国家、民族与社会前途进行了深入探讨,都认为时空异化阻碍了人们对国家民族前途与人类终极命运的探求,于是这两部作品中各自体现了二位作家基于社会背景的的思考及给出的解决办法,但他们的努力终究只是一场双向逆行的乌托邦臆想。

关键词: 杰克·凯鲁亚克; 胡里奥·科塔萨尔; 意象; 人类命运;

1. 前言

《在路上》与《南方高速》两部小说作品作为上世纪美洲文学作品中对“路途”与“终点”二意象进行描绘的小说之中的翘楚,凯鲁亚克与科塔萨尔立足民族背景与文化特色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在路上》的命名本身具有时空二重维度,而《南方高速》书名则突

出了旅途的单向性,这是由二者所采用的乌托邦幻想的模式不同而决定的。本文通过平行研究的方法对两部作品中的三个主要元素之异同进行对比,试图揭露其后的社会文化与民族心理因子。

2. 狂乱的乐音——凯鲁亚克、《在路上》与“垮掉的一代”

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 1922—1969)是战后“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主要代表作有《达摩流浪者》,《在路上》等。“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是凯鲁亚克提出的重要的概念,来源于他与约翰·克利隆·霍尔姆斯的讨论。^[1]在谈论“迷惘的一代”和存在主义的含义时,杰克·凯鲁亚克首先用它来指指称那些当时那种压抑的社会所打垮的青年人们。^[2]他本人对这个词的含义做出过多次解释:beat是爵士乐里的一个音乐术语,同时也暗含着基督教中的福音(beatitudes)的意思,另外还专门指那些反叛社会的、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年轻的一代。^[1]

颓废、迷惘、探求、失落的“垮掉的一代”的登场作为美国五十年代的重要文化现象,无疑是当时迷乱的社会现象的文学反映。一般,“垮掉的一代”通过《在路上》中种种荒唐的离经叛道行为表现着他们对这个时代的错乱与失落——一个美国挣扎在步入黄金时代的路途中、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梦”随着大战的落幕也几近破灭、铁幕徐落冷战升级、青年人的生命被填充在国际各地的冲突中……与其说“垮掉的一代”是一种自然孳生的文学现象,还不如说是一种忠实地、现实主义地反映着极端化了的美国社会形象的镜子。面对巨变时代,他们以疯狂自我放逐,却在逸兴遄飞后顿感孤独与失落。每一代年轻人都有权力享受的未来憧憬在他们这一代灰飞烟灭,他们于是哀嚎,于是接受了英雄式的古希腊追寻母题。“垮掉的一代”狂热奉行享乐主义的可以称为“热派”,个中翘楚可为《在路上》^[4];而与之相对的遁入东方哲学如禅宗等,寻找域外乌托邦的人们则可称之为“冷派”,借此抵抗物质主义狂潮,文学外化则为罗伯特·波西格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垮掉的一代是美国战后社会最为狂乱的一抹乐音,一脉相承地接续了柏拉图及其“迷狂说”指引的神明——只不过他们或用致幻剂、或用禅宗粗暴地替换了至高神灵的位置,并在醉酒般狂暴和如水般宁静的不停切换中写出富有时代特色的佳作,留给人们深切的思考。

3. 绚烂焰火照耀长路——科塔萨尔、《南方高速》与“拉美文学爆炸”

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 1914—1984)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万火归一》、小说《跳房子》等。《南方高速》是《万火归一》中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之一。

科塔萨尔是拉丁美洲新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之一,“拉美文学爆炸”指在上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间拉美地区的文学高

潮,一大批相关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流行于全世界,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可和赞赏,并持续影响了70年代以后拉美及其他国家的作家。拉美文学爆炸缘起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Angel Asturias, 1899—1974)的《危地马拉的传说》,以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勃莫》,马尔克斯一系列作品的出现为巅峰,通过对结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和社会现实主义等理念的炉火纯青的使用,将拉美文学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拉美文学爆炸”呈现出绚烂的爆发场景,是第三世界难得一见的文学焰火盛放,使得读者惊觉除了久负盛名的北美地区文学之外,美洲文学竟然同样存在着如此高成就的一批作家与作品,他们的辉光照亮着少数族裔文学前行的漫漫长路。

4. 永恒的公路——《在路上》与《南方高速》的对比分析

《在路上》(1957)与《南方高速》(1966)代表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被迷惘而不知所从的疑云所笼罩的时代。“垮掉的一代”与“拉美文学爆炸”所代表的南北美洲文学对这个问题同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与思考——永恒的追寻与不甘的回溯。若以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视角观之,都可以归入那个包含着伊阿宋盗取金羊毛、亚瑟王追寻圣杯、埋藏着《神曲》和《城堡》等巨作的世界文学最大主题之一——追求、追寻的主题之中。

《在路上》追寻的是目标不断迭代,主角萨尔的追求行动可以分为三步:逃离(当代社会、汽车、公路)——追寻(西部、新美国、墨西哥城)——回归(当代美国);而《南方高速》中主角“标致404上的工程师”的追求目标则简单得多,但也迷惘得多:不知何处的起点(枫丹白露镇)——最终的终点(巴黎),二者逻辑、思想具有内在贯通性。

4.1 到墨西哥城去!——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回环路途

首先,《在路上》的探寻路线概括来说便是向南去寻找乌托邦式的境外桃源。小说以萨尔·帕拉迪斯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讲述了他与好友迪安·莫里亚蒂的五次西行生活。萨尔的第一次旅行始于1947年7月,他的目标是传统的美国西部,目的是一览梦中的老西部的自由与美丽。最终达成这一目标的萨尔历尽奔波后回到了纽约;第二次旅行则是在1948年圣诞节期间出发的,应从旧金山远道而来的迪安的邀请,他们自弗吉尼亚出发又向西回到旧金山。在旧金山,被迪安冷落的他十分郁闷且局促,于是又一个人回到了家;第三次是在1949年的春天,萨尔从丹佛出发去往旧金山找迪安,他们决定从搭车回到丹佛,并从此出发去往芝加哥及意大利。期间一千一百八十英里的旅途仅仅用了十七个小时。但在纽约狂欢一夜后,

迪安“没有一分钱,有的只是无穷的烦恼以及同以往一样的狂热和匆忙状态。这一来,我们不能去意大利了”^[5];第四次旅程是南下前往墨西哥城,是最重要的一次旅程。他们一路上欣赏了古朴自然的墨西哥风土人情,但在墨西哥城中萨尔染上了痢疾,迪安也急着回到纽约去结婚,于是他们不得不踏上归途——这是全书最富隐喻性的一次游历;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旅行发生于1951年1月,迪安从西部来到纽约看望萨尔,而他们最后也仅仅是在纽约街头告别,小说至此完结。

可以将《在路上》的路线分为两条,一条是“西行”,另一条是“南下”。在小说中第一次“西行”的意义提及得非常直白明显,即“我身为作家需要新的生活经历”^{[5]10},“在校园里闲荡的周期已经结束,再待下去毫无意义”^{[5]10},并且他遇见了唤醒了他内心对西部的渴望的迪安。同时,萨尔对“现时其余的朋友都是‘知识分子’一尼采派的人类学家查德,谈话时嗓音很低、严肃地盯着你的、古怪的超现实主义卡洛马克斯,讲话时拖长声音、什么都要批判的老布尔里——不然就是那些鬼鬼祟祟的犯罪分子,例如目空一切的埃尔默·哈塞尔,趴在铺着东方毯子的长沙发上,不以为然地看着《纽约客》的简·李。……我所有的纽约朋友都处于消极的、梦魔似的位置,整天在贬低社会,搬出他们那些陈旧的、学究式的、政治学的或者心理分析的理由。”^{[5]11}的状态极为不满。一言以蔽之,则是逃离令他窒息的社会。可以说,西行的目的就是“反叛”,它背负起了全书主旨中的“逃离”部分。来到西部的萨尔并未对此行完全满意,他发现美国西部已经没有了完全意义上的荒野,更多的是与东部大同小异的城市。萨尔对丹佛非常失望,因为丹佛也成为了现代城市,它不仅与想象中的模样相差甚远,甚至与过去相比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城市化的脚步席卷美洲大地的似乎每一个角落。

与西行路线明确的担忧、失望与欣喜清晰主题不同,“南下”线路则复杂得多。这条路线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不仅承担起了全书内涵中的“逃离——回归”两个意义部分,同时还杂糅了作者的乌托邦与异托邦思想,甚至于对作品的后现代性意义进行最主要的填充。此处就必须谈及凯鲁亚克的墨西哥想象与书写。

凯鲁亚克的墨西哥想象与书写与他的亲身经历息息相关。凯鲁亚克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常常于墨西哥和美国间来去往返。例如1956年凯鲁亚克决定同母亲一起迁居加利福尼亚。他对墨西哥的多次探访为他的墨西哥书写奠定了最基本的思想基础。1950年6月凯鲁亚克第一次真正来到了墨西哥。这片与美国寸步之遥但却承载着代代美国人的异域想象的土地之上,凯鲁亚克寄托了极大的向往之情与乌托邦色彩,甚至构造了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式墨西哥。在《在路上》中他借萨尔之口高呼墨西哥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凯鲁亚克对墨西哥书写带有的乌托邦理想色彩并非来源于墨西哥本身之魅力,而是来源于战后美国人对“山巅之城”的幻想的破灭,或者说对美

国的乌托邦想象的破灭。《在路上》中凯鲁亚克不止一次用“应许之地”来形容美国,这是与“山巅之城”同为一套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同样都是表达着美国立国先民对建成一个宗教“净土”和“人人平等”的国家的期许。战后美国压抑孤独的社会气氛催生了对过去的怀念。凯鲁亚克也认为比邻美国的墨西哥代表着古老的人类社会,是文明的源泉。“垮掉的一代”面对山巅之城的废墟,开始质疑自我的、生存的意义与社会的价值。《在路上》更是集中体现了凯鲁亚克的“逃离”与迷惘。书中主人公萨尔独自漫步在丹佛街头时,他感慨:“我希望自己是丹佛的墨西哥人,或者甚至是穷苦的、过分劳累的日本人,什么人都行,只要不是现在这个活得腻味的、理想破灭的‘白人’。”^{[5]232}深受斯宾格勒思想影响的凯鲁亚克认为墨西哥是未受消费主义污染的“纯净”之地,他的笔触和肉体离开母国的意图都是在体验墨西哥中、书写墨西哥中更好地厘清自我身份,发掘生命的意义。

那么广大的墨西哥土地尚且如此,这个乌托邦国家的首都,映射着古往今来无数座乌托邦世界的万城之城——亚马乌罗提城、基督城、太阳城……的光辉形象的地方,该是如何一种人间天堂之境?于是萨尔带着巨大的热情冲向了中美洲的这座拥挤而落后的首都——墨西哥城——那座他从一开始便立志要去往的地方,那个他心中的至高天堂与应许之地,那个完美的玛雅之城。

这让读者不得不发出疑问:那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是现在,依然是饱受贫困、政局动荡、毒品、疾病困扰的墨西哥,真的是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精神中新的“应许之地”吗?并非如此。依据知识社会学创始人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对乌托邦的看法来说,乌托邦是一种“是与其所处境况不一致的思想状况”也就是说,乌托邦之所以成为乌托邦,在这种语境下并非因其自身具有的优秀性质或是已经建成了莫尔等人眼中的“人间天国”,而仅仅是因为符合我们“逃离”的初始目标,时空上的隔绝使得这块新地被人为赋予了“乌托邦性”。在这个他们人为构造的“乌托邦”国家中,萨尔等人来到妓院,其华丽外观与他们一路上看到的肮脏破败的土坯房和土坯墙形成鲜明对比。萨尔、迪安和斯坦在妓院里肆意寻欢作乐,一切束缚因素几乎消失,他们有的是金钱——拿着美元换来的大笔比索任意挥霍,他们绝无道德负担——身处异国他乡无人管制;他们没有法律威胁——警察毫不干涉他们的行动。这个妓院是这样一个空间:在这个人工制造的场所中,这些“垮掉的一代”们在对自己进行他们世界观中的规训,他们所作所为符合自己的梦想,他们的行为不用担负任何责任与后果。这正是完全符合福柯的“异托邦”的定义的: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文明中可能也有真实的场所——确实存在并且在社会的建立中形成——这些真实的场所像反场所的东西,一种的确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些乌托邦中,真正的场所,所有能够在文化内部被找到的其它真正

的场所是被表现出来的,有争议的,同时又是被颠倒的。这种场所在所有场所以外,即使实际上有可能指出它们的位置。因为这些场所与它们所反映的,所谈论的所有场所完全不同,所以与乌托邦对比,我称它们为异托邦。”^[6]由此正可以认为,凯鲁亚克笔下的墨西哥是一个“危机异托邦”。

而《在路上》中的异托邦墨西哥是历时性的,萨尔认为西方文明的腐坏不会影响到墨西哥人的生活——一道形同虚设的美墨边境竟然能给他们带来如此虚幻的想象——凯鲁亚克建构的墨西哥是与美国对位存在的差异空间。但若对其细细思索便可发现,事情绝非如此简单。“异托邦”的出现代表着墨西哥书写的“乌托邦”性质的裂解,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重新定义凯鲁亚克笔下墨西哥的形象。

考察凯鲁亚克的经历及《在路上》的全段墨西哥之旅便可以发现,无论是虚拟的萨尔还是真实的作为“垮掉的一代”个体的凯鲁亚克多么抵触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和规训,不断自我暗示墨西哥社会的理想性和乌托邦性,但抵达之后便会发现,肮脏的环境,恶劣的气候,令人难以下咽的食物与愚昧的当地人,让一个真实的墨西哥渐渐浮现在他们面前,主人公萨尔和其思想原型凯鲁亚克都渐渐恢复了对墨西哥的理智看法——他终于意识到世界上是没有现存的乌托邦的,他的幻想是何其幼稚与不切实际。幸而凯鲁亚克安排萨尔灰溜溜地离开了墨西哥城,回到了纽约——他心中的山城废墟之地,却发现自己可悲地囿于美国知识分子的底色而已经熟悉了现代社会,将那个遥远的,废墟的“乌托邦”墨西哥抛之脑后。

再者,《在路上》的旅行团体整体来看呈现出一个:两人——多人——多人(较少)——两人——一人(结尾分别)的人数变化趋势。若参照后文中《南方高速》的分析例式,本文认为这里体现着凯鲁亚克以及冷派的“垮掉的一代”的,杂糅禅宗思考的结果:个体追求人生甚至人类最终命运的旅途,固然是艰苦的,也许是有陪伴者的,但无论如何最终都要作为种群的个体,在外部帮助渐弱的情况下独立完成这场最为奥秘也是最隐秘的修行——无论以何种方式。

再者,《在路上》的南向旅程体现出了凯鲁亚克对于“追寻——回归”的思考。“垮掉的一代”的人们需要“追寻”的目标是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是如何与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对抗,是对生活意义和人生价值的深切求索,是一种叛逆精神的高昂。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以《在路上》中萨尔和迪安为体现一代人之所以选择追寻的方式,是因为现有的生活状况不能满足这些积极探求的青年们的精神需要与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作为社会生活的鲜明主体已经在心底里否认了这样一种生活,在美国式的自由思想与天主教基督徒的追寻与韧性传统推动之下,他们以叛逆的形式鲜明地宣示自身对社会和存在的思考,是对恶劣的生存境况与束缚人性自由发展的社会现状的坚决反抗。无论是对于墨西哥的乌托邦式想象,还是对

旅途的浪漫化宣传,亦或是对到达目的地的选择,其中深层透露的都是“垮掉的一代”对消费主义社会的反叛与对生活纯真内核的追寻。

但这种反叛是需要极大的代价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是一种决裂姿态的,自断后路的,为自我设置价值与意义标杆的反叛方式。若是在旅途中丧失了对意义的思考,沉迷肉欲享受之中,这些“上路者”便会感受到人生意义的终极缺失与铺天盖地的迷惘,正如第二次到达旧金山的萨尔一般。从选择成为上路者开始,这些“垮掉的一代”就选择了放弃稳定的生活与可预估的人生,选择自己担负起拯救自我的责任。迪安忠实地执行着这一个思想,于是他的行为便构成了对“老美国”的中产阶级传统、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最为激烈的反叛。

南向旅途中的迪安形象负责完成了“反叛、逃离、追寻”的部分,剩余的“回归”部分则是由本书的另一个主人公萨尔通过最终还是回归他本身的美国知识分子标签,也回归了他的中产阶级出身的结局来完成的。在小说开头以萨尔口吻说出的这句话:“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迪安不是现在的模样,而是笼罩在神秘之中的年轻囚犯”^{[5]3},已经明确宣示了萨尔的背叛。但这并不能说明萨尔是对“垮掉的一代”价值观的背叛,反而代表着原教旨主义的“垮掉的一代”被经过了思考与自我超越的新一代所取代的过程。

在五次旅行的过程中,萨尔在两人同游西部时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但随着旅程向后推移,他发现迪安的快乐并非来源于“目的地的到达”,而是来源于去往目的地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他的快乐是一种平常的自我快乐,自我放纵,表现在生活中便是沉溺于性生活等初级享受之中。旅行对迪安来说不是一种追寻人生终极意义的方式,而是旅行本身就是迪安追求的终极享受与生存方式——他自然也就无法从目的地的意义在达到当地后的进一步释放活动中感受到快乐。意识到这一点的萨尔失望也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所以,虽然迪安将萨尔引上了寻找之路,但是却终究被萨尔所超越。萨尔对迪安态度的变化不仅说明了主体的自我超越,而且象征着“垮掉一代”精神追求的变化。

小说里主人公的“逃离”行为是对于自我的追求,同时又是对于现实的回归。主人公的“逃离”行为是为了追求自我精神的终极领域,希望在“逃离”中找回本真的自我,从而建构更深层次的对于生活的体验和生活的意义;同时在经过一番实践后,主人公能智慧的顿悟到生活的意义,即追求生活的本真其实就是要通过回归现实的生活中去寻找和体会。总而言之,即还是在现实和理想中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追求自我精神和生活体验的同时,不排斥生活现实意义。

回归现实并非仅仅代表着回到庸俗。参照克尔郭凯尔的三种境界的人生阶段理论:审美阶段、伦理阶段、宗教阶段。^[7]克尔凯郭尔就此告诉人们,这三种不同阶段境界的人本质上其实并没有高低,只是他们选

择“行动”或者说“上路”与否的行为决定了他们所处的阶段。迪安是一个典型的属于审美阶段的人，完全沉浸在感官享乐之中，为自己而活，游戏人生。而生存于感官阶段和伦理阶段之间的萨尔，清醒地意识到了迪安的那种自我快乐是不可取的，而在路上的生活让他首次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在多种生存可能性中他选择了承担上路的责任，追寻异于现实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但是他在上路的过程之中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与社会职责的缺位——这并不是“垮掉的一代”所追求的，但萨尔已经对其内涵进行了突破。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宗教阶段的生活是为信仰所支配的，人要经过信仰的跳跃，才能摆脱审美阶段和伦理阶段所推崇的道德规范，这也正是萨尔即将要去做的，正如吉尔伯特·米尔斯坦《评〈在路上〉》一文中就这样写道的：“在我看来，这正是凯鲁亚克已经身体力行的——‘有必要树立信仰’。”于是萨尔回到了那个熟悉的身份与世界——在这里，他要建立自己新的信仰，他要获得完全的自我，他要超脱于同代人之上——只有回归才能带给他精神土壤与力量，只有在传统的天主教思想领域中他才能完成这个过程，这是东方的禅宗给不了它的。于是，萨尔的形象完成了突破，终于成为合上全书“逃离——追寻——回归”精神框架的那个最后的、也是最关键、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由此，通过对凯鲁亚克《在路上》旅途和墨西哥书写两个部分的分析，可以对《在路上》的终极目的地：墨西哥城具有的综合性内涵进行分析：凯鲁亚克通过推动时间的流动而使得墨西哥书写成为现实和形而上理想的结合点，墨西哥城成为了那个“似乎到达而又离开”的意象——凯鲁亚克在对墨西哥形象的追寻与实践过程中追寻“垮掉的一代”的终极理想，等真正到达异托邦后又惊觉这并非之前思想所认为的目的地，完成了“离开——追寻”的阶段，并在这样的思考与厘清中完成了自己思想的进化与人生意义的确认，在离开“墨西哥城”意象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追寻——回归”的升华，最终选择美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以达到自己的人生的最终阶段。

《在路上》全篇中无论是作为终极目标的“墨西哥城”的内涵，还是迪安和萨尔旅程的地理空间意义、时间意义及深刻内涵，亦或是其中体现的作者本人的思想都经历了一个回环式的发展过程，这便是《在路上》的圆形框架，徒劳追寻的最后是回到原点，接受一切。

4.2 永远抵达不了的渺远巴黎——科塔萨尔《南方高速》中的幻悲孤途

作为“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之一的胡里奥·科塔萨尔在五十年代已经凭借脍炙人口的《动物寓言集》等短篇小说名声大噪，并得到了拉美文学界的一致认可。当年笔力尚显稚嫩的后辈马尔克斯也丝毫不掩饰对他的崇拜与仰慕，他评价科塔萨尔到：“他活像巨人显圣”。进入六十年代后，他于1963年出版的小说

《跳房子》、1966年出版的《万火归一》更是将拉美文学爆炸运动推上云巅，《万火归一》中的《南方高速公路》也作为他的短篇小说新高峰被提出。有批评家认为拉美文学中以博尔赫斯为先锋，以比奥伊·卡萨雷斯和胡里奥·科塔萨尔为两翼的特殊一派的小说，从风格上来讲，可以单独地归为“幻想派”，而非类似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按照法国语言学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其著作《奇幻文学概论》提及的，“奇幻”是一个只了解自然法则的人在面对明显是超自然的事件时心态的摇摆不定。科塔萨尔本人也在《对“奇幻”的感觉》中提出：“读者最好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通过其自身的日常经历去寻找‘奇幻’。”《南方高速》深切地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小说内容以一段看似平常的堵车经历为内容，描写了一群从枫丹白露镇前往巴黎的驾驶者，遭遇一次原因不明的严重的交通堵塞，被迫滞留了无从计算的时日，由此在南方高速上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微型社会，并在其中孳生出社会关系与情感连接，却在突如其来的畅通交通之中瞬间破碎的经历。在这篇小说中，科塔萨尔以其出色的奇幻叙事技巧，展现了其独特而迷人的写作风格。

《南方高速》（《南方高速公路》）与《在路上》的路途描写最重要的区别便是在于，相对于后者的南下追求乌托邦式梦想的路线，《南方高速》内容中描写的北上的枫丹白露或不知何处出发的，去往巴黎的路线显然是拥抱现代化的一条道路。这里便不得不提及以科塔萨尔为代表的一代拉丁美洲作家的生平，如卡洛斯·富恩特斯、加西亚·马尔克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等作家都曾在欧洲旅居——对于这些曾经的殖民者，拉丁美洲的作家与人民早已深受他们的文化影响，心中也自然地将其认为是拉美国家发展的榜样与未来。科塔萨尔相比他们却更加深入地受到了法国或欧洲文化的影响。他虽是阿根廷作家，但出生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其父为阿根廷驻比利时的外交官，有阿根廷和比利时的双重国籍。他受到了欧洲文学和欧洲思想的深刻影响，这体现在他将早期诗歌集结出版的《仪表》（1938）中。这本集子所选诗歌大部分是十四行诗这一典型的欧洲诗歌体裁，内容也明显地受到了欧洲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诗歌流派的影响。后来，科塔萨尔本人也出于对阿根廷国内政局的失望，于1951年独自离开阿根廷去往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并进行文学写作，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祖国。但科塔萨尔用来写作的语言却是西班牙语，他的小说的题材也大都是关于拉丁美洲、特别是他的祖国阿根廷的。他对这段流亡生涯的评价甚至是积极的，他诙谐地称流亡是拉美独裁者们颁发给每个热血青年的出国“奖学金”，还特意提及：“我们理当从流亡的痛苦联想到敌人的凶险，并自强不息……悲观失望、自暴自弃是不明智的。”

《南方高速》是一条荒唐且神秘的时空扭曲旅程，其魔幻到即使如“机械装置和收音机里传来的‘哔哔’”声全都具有了另外的含义，只代表着那些没有愚蠢地选择星期天下午从南方高速公路回巴黎的人

所需要的时间，因为他们刚刚出了枫丹白露，就不得不加入车流，在两条车道上各排起六条长龙（大家知道，星期日高速公路只供返回首都的车辆行驶）”^[12]，仅仅提及了“刚刚出了枫丹白露”，而非是从枫丹白露所来。那么，科塔萨尔在这里的真实内涵实际上是说明从无垠的南方去往北方，及其中心巴黎的路途。这一股被“堵住”的车流自然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深刻内涵。由此可以基本推定，科塔萨尔选择的从南往北去巴黎的高速公路不仅是因为选取的目的地是他熟悉而喜爱的巴黎，同时也蕴含着拉丁美洲去往他心中文明中心——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内涵在其中。

这条从南向北，没有刻度，没有指示标，没有真实可感的时间观念的高速公路或者说科塔萨尔为我们设计的路线其真实内涵为何？

对此也许可以从巴赫金对文学理论中的时空体进行的基本定义中获得启发：他对其定义到“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之称为时空体”^[10]。实际上，这正是科塔萨尔为读者们设立的一个虚构时空体，一个在其中通过对时间、空间的一步一步的抽离探寻人类最本质问题的模型。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索这条路线的深层象征意义。首先，是这条道路上体现出来的封锁式的社会性。有别于《在路上》的“二人到多人再到二人，最终仅剩一人”的旅程，《南方高速》为读者们描绘的完全是一条从一人变成多人的，要素齐全的小社会。从社会形式上来说，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形成了一个封锁的空间，这个空间中逐渐由几辆固定的车形成了稳定的，九宫格布局的方形车队，例如“王妃”“标致 404”“ID”等等。从社会成分或因素来说，有军人所代表的暴力机器及武力，有跳车逃跑者所代表的叛逆分子，有黑市和交换代表的经济分子，有移居到另一部分车流中的侨民，有自杀与自然死亡带来的毁灭，有排外及作为整体的高速车流被法国农民所排斥的“民族性”，有军人及其妻子带来的生殖与工程师和王妃牌汽车上的姑娘的爱情，有以两个年轻人为代表的游手好闲的偷窃分子，有以医生、休息室和稻穗代表的服务业、工业与农业、甚至还有以拥堵结束作为救世标志的终极关怀……

但这个看似齐全的小社会实质上是一个用工业化、后现代化因素部分替代了人们之所以为人的某些原始部分而组成的异质化社会，本质上来说是另一种“异托邦”，或者说更类似欧文等人推行的新和谐公社的“空想社会主义社会”，其中具有按需分配，互帮互助等等因素。但其中组成社会的个体不再作为活生生的人，而是直接以其在这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称呼，如“标致 404 上的工程师”、“王妃上的姑娘”……原始的姓名的意义被消解，被工业化的标签+生理阶段或社会地位的组合物所代替，这正体现出科塔萨尔疾呼的人类社会的原生性渐渐被工业社会所带来的机械与冷酷所代替，而若是这份支撑社会产生的情感基础或原始性部分被代替——即《南方高速》中建立起来的小社会的模样，最终依然会轰然崩塌。

《在路上》也深刻地体现出这一点，萨尔正是惊吓、憎恶于消费社会的可憎面目，它使得每件物体都商品化、每个思维都工业化、每个人的个体性被消解、意义被质疑。从这个角度来说，科塔萨尔与凯鲁亚克的担忧是同一的，即就算是在社会关系最为理想，最为成熟的情况下——为之甚至配备了共产主义因素的消费社会、工业社会对人的依然存在的异化。凯鲁亚克更是直接跳出来批判到：“现代人为了买得起像冰箱、电视、汽车（至少是新款汽车）和其他他们并不是真正需要的垃圾而做牛做马，让自己被监禁在一个工作——生产——消费——工作——生产——消费的系统里，真是可怜又可叹。”^[11]

其次，是这条道路上的模糊化的时空观念。本作中的“时空”是最为直接的体现了科塔萨尔的“奇幻”观念的部分。其中主要表现在天气的剧变、死亡的迫近与真实、逃离与救世等因素上……首先，小说一开篇便设立了一个模糊的时空背景——详细位置未知、详细时间未知（仅仅知道是周日下午）、交通拥堵的来源未知——多种流言蜚语扑朔迷离。但它就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了，甚至直到最后结束时，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个没有解释的谜团，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其次是时间的把控，一开始，科塔萨尔明确指出交通拥堵发生在一个周日下午，但这实际上是他最后的仁慈——他在此后的全篇小说中把收音机、钟表等等能够指示时空的现代物品全部“静默化”，让其不再产生任何作用，人们也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信息。接着，小说的时间要素开始慢慢消失。从“到了午睡时间”“黄昏时分”等叙述中还能得知时间是中午或傍晚。后来，随着车流拥堵时间的增加，有那么一阵，工程师真想把这一天从自己的记事簿上删去——但后文中又直接证明了绝对不止一天。接着陆续提到一些早晨、日落、午夜，有时候会出现如“八点钟”“快到凌晨三点”等具体时刻。当读者认为时间观念将从此重现时却会在后文中感到绝对的被戏弄与孤独感——科塔萨尔笔锋一转，直接引入了季节的变更，到最后更是完全通过大雪等方式模糊了时间计算。全篇的季节变化可以概括为：太阳（极为炎热季节）——暴雨（极为猛烈）——暴雪（似乎永不停歇）——一切如常（驶往巴黎时），读者若是要是想从中探寻到科塔萨尔在这本小说中的时间观念但凡有一丝一毫的理性都是不可能的。相反，他正是以此玩弄着读者的对时空最基本的认知——“时间是确切可感的”，让人们陷入时间的迷局之中，也借此将意义深入到更深层次的地方——这一点是在对“目的地巴黎”的描写中达成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这条道路的明确而又蕴含深意的目的地：巴黎。巴黎作为与维也纳、罗马齐名的欧洲艺术之都，在西方视域中历来作为文明的核心进行描绘，深受欧洲文化的科塔萨尔也不例外。他笔下的巴黎在《南方高速》中代表着现代、文明、爱情、及获救（拥堵解除之后）后的终极目的。然而在奔往巴黎的路途之中，这个轻松凝结在一起的，

看似具有极强凝聚力，甚至在其中产生了生殖与爱情因素的牢固社会结构却在奔腾如水的车流中消散成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并最终烟消云散。正如《南方高速》的结尾一般：“工程师本来还希望借助于各排行车速度的变换最后赶上王妃，但是他终于逐渐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原来在一起的那些车子已经不可挽回地四散，陌路之人的朝夕共处、司空见惯了的琐碎事务……都成为过去……他连一辆认识的汽车也没有找到，一些从未见过过的面孔以惊奇或者漠然的神情从各式各样的窗口里面望着他。……仿佛能够理解他的心情，指了指巴黎的方向，示意他不要泄气……404 的左手边出现了一辆托努斯，刹那间，工程师觉得人们重又聚到了一起，秩序井然，可以齐头并进。……只好跟着车队朝前驶去，机械也采取同周围的车辆同样的速度，别的什么都不要再想了……对，只能是这样，这一切都不可能再复返……汽车正以八十公里的时速朝着越来越亮的灯火飞奔，然而，谁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那样着急，谁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混在陌生的车队里连夜疾驰。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毫不了解，大家全都凝视着前方，一个心眼地凝视着前方。”^[12]在去往巴黎的路途中，小社会悲戚而绝望地四散，怀有留恋之情的工程师被无情地嘲笑与恶意对待，只能明了过去的世界一去不返了——那个理想的社会关系，人人互助而按需分配，临时性的共克时艰的小社会形式崩塌了，工程师祈求的爱情也消散了。直到此时他才明白除开他之外，社会的每个人都是抱有一种临时参与的性质在其中的。他的幻想就此全盘破灭，带着破碎梦幻的恍惚和梦醒时分的悲伤重新踏上了渺远的孤途。

结合前文的西班牙语情意结与为祖国故土书写的理念，科塔萨尔在此的行为是试图描绘一种奔向拉丁美洲人视域中的未来与现代化的旅程，这趟旅程充满着孤独与悲苦——拉美国家们朝着自己心中的“乌托邦”北方——确切来说是巴黎，奔去，最终发现这条道路不过是自己的幻想，巴黎并不是最终的结局。这样幻灭的结果一如《在路上》的墨西哥乌托邦结局。于是，科塔萨尔借此将内涵再度拔高，由拉丁美洲人对现代化的追寻之旅上升到人类对终极意识，终极目标——以乌托邦为代表的大同社会的追求，在这条对人类物种终极意义的探索道路上，人类不仅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而且独立个体结伴而行的形式——也就是人类社会，面对渺远孤独而又注定难以探求到的目标来说也不过是一个空壳罢了。科塔萨尔通过《南方高速》哀叹到，人们“谁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混在陌生的车队里连夜疾驰。”，人们只知道向何处去，却不知如何到达——这不正是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小说，以及自黑格尔到尼采到马克思所探讨的人类终极命运吗？

于是，结合科塔萨尔为读者描绘的永恒难达路途、踏上旅途的封闭小社会、其中个体的幻灭与破碎等可以发现，科塔萨尔试图描绘的并非法国南部的一条高速公路，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在探寻自身意义、时空结

合与终极关怀时的幻悲孤途。但他也指出，作为时空旅行者的读者，甚至作为远见者而试图探讨这个问题的他也不知道结局如何——他于是借着这股迷惘创作了《克罗诺皮奥人和法马人的故事》（1962）、《仪式》（1969）、《故事集》（1970）、《八面体》（1974）、《有人在此》（1977）、《一个叫卢卡斯的人》（1978）、《我们如此热爱格拉纳达》（1981）、《不合时宜》（1983）等等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集全都有幻想性质，题材围绕欧洲、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的生活和历史，以及拉丁美洲特别是阿根廷的社会生活来展开，每篇小说都带有神奇的反逻辑的情节，来呈现 20 世纪混乱不堪的人类状况。正如他在对自己另一部作品《中奖彩票》中故事的评述一般：“我同书中主要的人物处于同样的境地，直到如今，我仍然不知道船尾发生了什么事。”^[13]，科塔萨尔眼里的人类终究是无知且迷惘地在时空的茫茫沧海之中孤独地架设着链接时空的虚幻高速路族群。

5. 总结：《在路上》和《南方高速》中“旅途”和“终点”的内涵异同

总的来说，凯鲁亚克《在路上》与科塔萨尔《南方高速》都是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描绘着“旅途”与“目的”的深刻意义，但二者的方式，目的及隐喻都有不同。

凯鲁亚克通过从北到南的路途架设，在不发达地区建立自己脑海中的乌托邦与异托邦，体现的是一种“回归人类曾经有过的黄金社会”式的乌托邦幻想，探求的是消费社会和宗教信仰缺失所造就的“垮掉的一代”对自身意义的探求过程，是一条回环式的旅途：从叛逆地在苦闷和孤独中反叛社会到出走、逃离以寻求自身存在再到如克尔郭凯尔等人所说的了解到自身的意义终究在于养育自身的基督教及美国中产阶级环境，最终选择回归正常社会，在平凡的生活寻找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在时空旅行中将这条寻求最终解脱的道路又架设回到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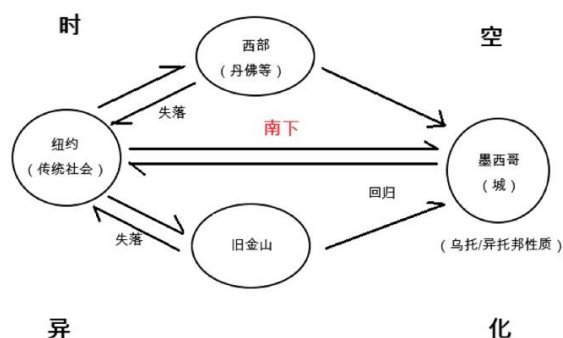


图1 《在路上》的时空路线结构

而科塔萨尔通过的则是一条由南到北的道路的假设，寄托着第三世界国家对发达的现代世界的向往，建立的是一个“追求发展与发达”的现代化的乌托邦

幻想，急切地探求的是阿根廷祖国，乃至整个拉丁美洲如何立足于现代世界的被抛弃感、孤独感与隔绝感，为此科塔萨尔试图让体现为车流的人们联系在一个更紧密的，理想化的世外桃源社会中共同追求未来乌托邦幻想，但最终却悲戚地发现这只是他的一个幻梦，被现代物质消费社会与思想污染的人们只会，也只能在依稀预见未来地平线时分崩离析地追求自身的率先。也就是说，科塔萨尔在踏上“南方高速公路”时便已经知道永远无法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但在现代科技与人类发展浪潮的裹挟之下不得不拖着古老的拉丁美洲前行，同时还要抗击先进者们的掠夺与攫取。正如他后来关心祖国阿根廷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发展而写作的，抨击和批判美国跨国资本对拉丁美洲的掠夺和攫取的《反对跨国吸血鬼芳托玛斯》（1975），这也正是他在《南方高速》中所要表现的重要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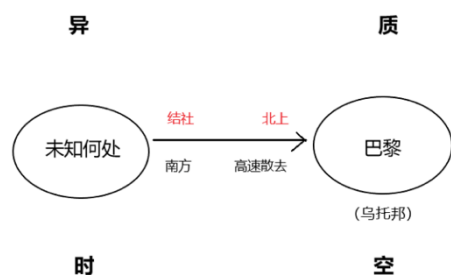


图2 《南方高速》的时空路线结构

在这趟幻悲孤途中科塔萨尔绝望地通过书写直接将意义上升到人类族群，揭示出这条人们试图通往未来与大同社会的连结道路即更广义上的“南方高速公路”是无可架设的，任何试图打破现代社会已经被异化了的、魔幻化了的时空体的举动都是徒劳而无意义的，人们只能等待着最终拯救的到来，并在神灵预示下疯狂地以个体形式奔向尚未确切知道是否能够到达的终极解救，这是科塔萨尔对道路的自我理解。

虽然二者的内涵有巨大差异，但在“追寻”的主题研究框架之下是两条不同的道路，科塔萨尔与凯鲁亚克均作为美洲文学的代表与先驱对这个西方文学经典母题做出了自己的探索。但他们的终极试验都是以某种程度上的悲剧而结束，他们都以发现“作为个体的人”的无力与“作为某个群体的人或社会”的，在时空异化条件下的脆弱而黯然收场。他们的尝试与探索启发着一大批美洲文学后来者，于是出现了试图打破这一时空乱境的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可以说，人类徒劳地双向逆行的乌托邦幻想永远不会停歇——只要人类种群还保有对未来的好奇与探求，对自身命运的无限求索，这条长路便会继续编织下去。

REFERENCES

- [1] Xiong X. On the Lonely Road: an Analysis of the Multi-structure of On the Road (in Chinese) [J]. 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2011, 30(07): 66-71.
- [2] Wu X. From the Life Without Future To the Ruin—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n studying Jack Kerouac and his novel On the Road (in Chinese) [J]. 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2001(03): 83-86.
- [3] Zhang C. An Analysis of Confession Consciousness and Self-redemption Ways in Jack Kerouac's Novels (in Chinese) [D].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1.
- [4] Zhang L. Desperate choice-- Jack Kerouac's "on the road." (in Chinese) [D].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12.
- [5] Ann (Editor), Jack (Author). On the Road, Kerouac [J]. 10.
- [6] Xiao W. Michel Foucault's "Heterotopia" in the Chinese world: its semantic bifurcation, generative drive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in Chinese)[J]. Literatures in Chinese, 2017, (06): 53-61.
- [7] Zhang L. Desperate choice-- Jack Kerouac's "on the road." (in Chinese) [D].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12.
- [8] Qiu H. Collision and echo in spatial displacement -- Latin American novels and Chinese novels since the late 20th century (in Chinese) [D]. Wuhan University, 2014.
- [9] Cortazar J, Bernardez A. La Autopista del Sur y Otros Cuentos[J]. 1996.
- [10] Wang Y. On the aesthetic origin of literary space criticism [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4, 20(05): 190-197.
- [11] J Kerouac. The Dharma Bums[M]. Blackstone Audiobooks, 2005.
- [12] Cortazar J, Bernardez A. La Autopista del Sur y Otros Cuentos[J]. 1996.
- [13] Zhao D.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hinese) [M].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9.